

现代性问题对话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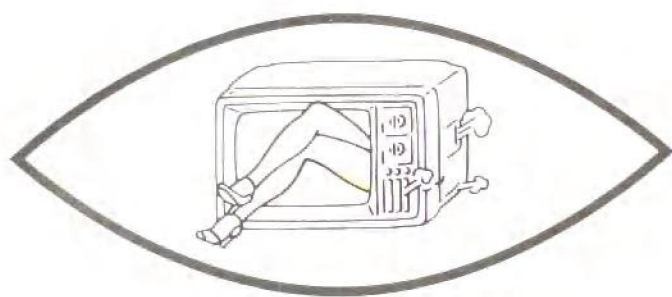
经济学

Dialogu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视野里的

社会现象

朱国宏 主编



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Social Phenomena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问题对话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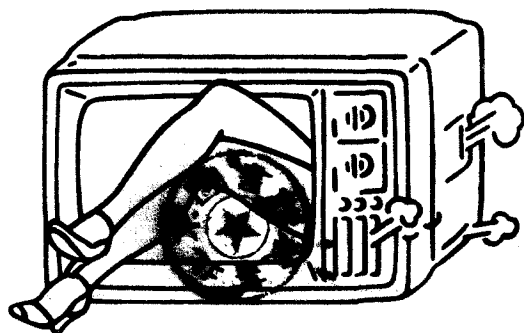
经济学

Dialogu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视野里的

社会现象

朱国宏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何朝霞

封面设计:杨 群

技术设计:何 华

·现代性问题对话丛书·

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现象

朱国宏 李志青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仪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4222-1/F·417 印数:1—8000 册

定价:14.80 元

丛书总序

朱国宏

正如所有的人类都源自一个祖先，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学科都源自一个学科。事实上，在有人类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早期，并没有学科分类，而只有经验和知识的记录，即使是到当今诸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也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类和界限。然而，正如人类起源后，历经进化和繁衍的结果是，形成诸多不同的种族、民族乃至国家，人类的经验和知识也因为丰富和发展而逐渐分化为诸多学科，如哲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等等。到本世纪，特别是晚近这几十年，甚至大量涌现了诸多新兴的学科，有所谓的交叉学科，也有所谓的边缘学科，林林总总，构成了庞大的学科体系群。

从学科发展史上看，每一个学科都经历了由形成到发展再到

独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每一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领域范围内细分化、专业化和体系化，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整套“专业术语”和学术研究领地，相应地，各学科研究者的分工亦愈益细分化和专业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的研究者且说不可能兼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连社会科学里的“通才”也是难以发现的，甚至，能够兼通几门学科的“大家”也已不多见。司空见惯的是，某一学科的某某学家，甚至是某一学科中某一领域的某某专家。

这当然符合“知识爆炸”时代的学科发展规律，也符合“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时代”的社会分工规律，但是，这样一来，学科间的交融少了，学科间的隔阂多了。同是社会科学家，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不再有共同语言；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难以实现对话；……诸如此类的现象愈益增多，使得各学科自顾不暇，也没有兴趣去关心别的学科的发展，同时，学科间的相互误解、相互不信任乃至敌视也时有所闻。更重要的是，学科交融所创造出的创新频率大大降低，而低水平重复的成果却相应增加了，以致于，一方面是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任何学科学者已不可能遍读本学科的所有研究成果，遑论阅读其他学科的成果，另一方面，真正高水平的“大家”成果日见稀少，让人喟叹“高人不世出”。经济学者感叹，像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这样的“大师”恐怕再也不会出现；社会学家也感叹，像孔德、涂尔干、韦伯这样的“大家”从此难觅……

学科发展的这种“规律性”恐怕是难以规避的。正如“前工业社会里”人们可以同时精通几种技艺而“后工业社会”里人们

大多只能拥有一技之长一样，我们不可能要求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在日益分化和细化的社会里精通所有的知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更有大量的莘莘学子靠熟读四书五经而搏取功名，而现在任何一个大学生，所读过的书籍恐怕远远超过古代的“状元”，但谁又能说自己已经“学富五车”？实际上，在其所学的学科领域中是否可算是已经“入门”也是大可置疑的。

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学科专业化的事实，更无法改变由学科专业化引出的研究领域细分化问题，然而，其中暴露的问题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忧虑：其一，学科的形成往往是学科交融的结果，如经济学得益于数学、物理学和政治学的交融，社会学得益于人类学、心理学的交融，心理学得益于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交融等等，而一旦一门学科形成后，却往往拒斥别的学科的侵入或无视别的学科的存在，哪怕是相关学科；其二，与此相联系的往往是不同学科研究同一问题而互不交流，既造成重复劳动，又筑成学科藩篱；其三，同一领域问题的不同研究，使研究成果分别积累而难以进展，甚至连错误也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学科间的误解和歧解增加，甚至相互攻讦；其四，学科发展缺乏活力，缺少创新，发展缓慢。

在我国，这些现象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已经开始在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某些学科领域里，因学科创新活力的缺乏，已有学者提出该学科是“朝阳科学还是夕阳科学”的问题。应当说，学科间的交融和对话问题已摆上学科发展的议事日程，亟待引起重视和关注，并加以解决。

也许应该说，近几十年的学科发展虽然有学科独立的一面，但也有学科交叉和融合的一面，而这一面是近几十年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标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涌现了许许多多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而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产生正是多学科相互交融的结果。这种交融的途径有二，一是某一学科以其理论和方法向传统的非本学科领域渗透，另一是该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和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相交融而形成新的学科。无论是哪一种，都大大拓宽了学科领域，并促使了学术研究的创新，使一大批新的成果面世。应当说，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也在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学科交融和对话的重要性。

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学科发展问题，如果说在 80 年代主要是补课，即补上因被耽搁而落后的那一课，因而，许多学科都致力于形成和发展本门学科的体系，那么，到现在，也到了开始进行学科对话和交融的时候，已有学者开始指出学科对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让学科藩篱继续存在下去，势必阻碍学科的发展，从而也落后于国际学术界。

本丛书的主题旨在强调“学科对话”，推动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目的在于介绍和评价不同学科对同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期冀引起相关学科的注意，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和加入这一领域的工作。这种对话，既可以是讨论两门学科各自对对方学科的研究，如本丛书第一套的《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又可以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研究，如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我

们认为，这种对话对于拓展各自学科的视野，对于增进学科间的交流和融合，是颇有裨益的。同时，我们也相信，这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必将对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有所推动和助益。

朱国宏

1998年7月20日于一缘斋

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代前言

对话及其意义

提倡经济学与社会学对话不只在于这种对话既必要又有可能，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不对话的现实。经济学者孜孜以求于“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自顾不暇；而社会学者津津乐道于“纯”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无暇他顾。这样的结果是，经济学与社会学各自营造其壁垒，如两座城堡遥相呼应，“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有经济学者谈论社会问题，十有八九会被社会学者斥为肤浅，而如果有社会学者指点经济问题，百分之百会被经济学者认为是谈论其不懂的东西。关于前者，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S.Becker）早期对人类社会行为所作

的经济分析在社会学界引起的反应中窥见端倪；至于后者，早在社会学的命名祖师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那里就已领教过经济学者的尖刻批评，当时的经济学者认为孔德讲经济学是在讲他完全不懂的东西。

对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人为筑就的学科藩篱的这种判断也许有失偏颇或夸大，但是，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从不试图沟通和对话，则是不争的事实。加里·贝克尔等人的人类行为经济分析，一向为主流经济学所拒斥，即使是在他于1992年因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时，仍有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不予接受；至于主流社会学，只要翻一翻那些流行的教科书就可知道，主流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经济”的一席之地。

这似乎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并没有太多必然的联系，二者之间的拒绝对话也并不影响各自的学科发展。然而，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并且，二者之间的隔阂不仅造成了“公共”的问题，而且也影响了各自学科的发展。所幸的是，这种后果已分别引起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注意。譬如美国经济学者斯坦菲尔德（R.Stanfield）就曾尖锐地指出：

“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已经进入不结果实的形式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它被保护起来以避免实践检验的破坏，而且，虽然人们普遍关注政策和道德标准，而它在这方面已明显地赶不上时代，但却仍然盛行。……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过程定义为面对稀少进行选择，实际上其整个核心都依赖于对经济的逻辑演绎分析，忽视了对在历史上同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行为分析。强调通过计算机得出来的选择很明显

是同在制度上偏爱市场交易纠缠在一起的。交易过程能有效地控制个人价值的观念已经导致了市场价格和社会价值的实质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导致了失真的政策建议和政策评估。”^①

正统经济学这种把市场资本主义的特殊情况上升为一种普遍原则的做法导致了“经济学家的谬误”（economistic fallacy），而这种谬误的存在也是“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原因之一。^② 同样，在社会学界，也有社会学者意识到这种学科藩篱的障碍作用，如美国社会学者特纳（R.H. Turner）就曾指出：

“有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限制了社会学的完善和运用。其中之一是：由于重新找出从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困难，不同专业而从事同样或相关问题研究的人缺乏沟通，因而有些劳动都重复和浪费了。……不同词汇的使用，专业期刊的滥出及会议的频繁不仅导致了重复浪费，而且也使研究人员无从吸收其他学科的养料（这在新观念时代是非常必要的）。问题和题材惊人的同质现象时常被表面结果的殊异掩盖了。……我个人则相信，愿撇开细小枝节及在研究中探索问题时能跨过学科界限的有较独立意志的学者才能给社会学带来益处。”^③

显然的是，提倡学科对话，将有助于上述两个学科存在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说，我们正处于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正如在每个学科的源头曾经融为一体那样，只有融合、交流和对话，才能求得创新和发展，从而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和革命。

^① 参见斯坦菲尔德，“制度分析：经济学中即将到来的革命”，载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 参见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前引书，第13页。

^③ 特纳，“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第4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经济学与社会学

寻求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自然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的事情，然而，归根到底还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对话的可能性，而探讨这种可能性，又不得不对其各自的学科定向历程作一检讨。

首先也许应当指出，经济学与社会学之所以是两个学科，是由于有着各自的学科形成和发展历程，有着各自的学科传统，甚至有着各自不同的开山祖师。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一般公推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A. Smith)，因为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般简称为《国富论》)(1776)中所论述的经济问题构成了现代经济学诸领域的源头。这是就其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而言的。事实上，亚当·斯密既不是系统论述经济问题的第一人，更不是“经济学”学科的命名者。在亚当·斯密之前，有重商主义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经济学家，还有经院派的经济学家，即使是在古典学派中，还有先于他的威廉·配第(W. Petty)等经济学家。至于“经济学”的命名，就词源而言，“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色诺芬(公元前431—前354)的《经济论》中，但是，他所使用的“经济学”(oeconomicus)一词与今天的“经济学”含义“风马牛不相及”，其义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①。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在古典时期被称为“政治经济

^① 参见亚当·库珀、杰西卡·库珀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经济学”条。

学”(political economics),它起源于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A. de Montchretien, 1575-1621)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所以,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又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时代”^①。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分化为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前者是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后者是新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到19世纪末主流经济学形成一个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 Marshall, 1842-1924),他在其集大成著作中冠以《经济学原理》标题,被认为是首次使用“经济学”(economics)作为学科名称^②。如果说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祖师,那么,马歇尔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直接奠基人。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基础上,美国经济学者张伯伦(E. H. Chamberlain)和英国经济学者罗宾逊夫人(J. Robinson)分别在《垄断竞争理论》(1933)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中建立了“厂商理论”,初步确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反马歇尔传统的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J. M. Keynes)则在其所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般简称《通论》)(1936)一书中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③。从此,主流经济学以其完整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而确立了其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地位。

相形之下,现代社会学的历史似乎要比现代经济学逊色一些。首先是作为其祖师的奥古斯特·孔德,不仅生年较晚(1798),没有赶上亚当·斯密时代,而且其著作主要的不是社会

^① 参见《辞海·经济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政治经济学”条和“蒙克莱田”条。

^{②③} 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学著作，没有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为后世的社会学者奠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寻根体系。孔德之于社会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命名了“社会学”这个学科。也许是学习自然科学这个背景（他早年学习数学和工程学）的缘故，孔德试图创立的“社会学”是按照“科学”的设想进行的。他从1926年起在巴黎开设实证哲学讲座，后来将讲稿整理成书，以《实证哲学教程》为题分六卷从1830年开始陆续出版，到1842年出齐。他的“社会学”概念最早是在1837年的系列演讲中提出来的，1839年在成书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改“社会物理学”为“社会学”，正式提出了“社会学”的学科名称。从构词法上说，社会学(sociology)一词由拉丁词 socius (社会的) 和希腊词 logos (道理) 构成。孔德将“社会学”区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个分支。并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为此他又提出“实证社会学概念”^①。孔德的“社会学”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社会科学，或者，按照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所说，是“为社会学研究争得了地盘，预告了社会学研究的到来，而并非创立了社会学”。^② 在追溯社会学研究的先驱者时，除孔德外，还有许多19世纪的学者被列为先驱者，甚至连亚当·斯密、休谟这样的经济学家，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等也被作为早期社会学家，这或许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庞杂有关。但是，真正为后人奉为“大师级”的社会学家毕竟还是少数，在这少数人中，涂尔干

^① 参见刘豪兴主编：《国外社会学综览》第一篇及“孔德”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亚当·库珀，米西卡·库珀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前引书，“社会学”条和“孔德”条；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学漫谈》，第1-11页，第90-9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转引自刘豪兴主编：《国外社会学综览》，第57页。

(E. Durkheim, 1858 - 1917, 又译迪尔凯姆或杜尔凯姆) 和马克斯·韦伯 (M. Weber, 1864 - 1920) 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此外, 还有斯宾塞 (H. Spencer, 1820 - 1903)、马克思 (K. Marx) 等人。涂尔干以其社会学研究而拥有法国第一个社会学教授的席位。他的《社会分工论》(1893)、《自杀论》(1897) 和《社会学方法论》(1895) 等著作对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影响极大。韦伯则构建了他的“解放社会学”理论体系并应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和欧洲制度的起源等问题。虽然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经验的研究都起源于欧洲, 但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并加以发展的, 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在美国。第一次将社会学列为大学科目的是萨姆纳 (W. G. Sumner, 1840 - 1910), 他于 1874 年在耶鲁大学首次开设社会学课程。1834 年, 芝加哥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大学社会学系, 两年后又创办了一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 其始作俑者斯莫尔 (A. Small) 还与人合编了一本《社会研究导论》(1894),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在美国另一所大学——哈佛大学, 索罗金 (P. Sorokin) 不仅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还直接影响了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学界权威人物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帕森斯 (T. Parsons)。帕森斯的主要成就是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系统分析。应当提及的还有几乎和芝加哥大学同时成立社会学系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其创办人吉丁斯 (F. H. Giddings)。吉丁斯极力推崇用统计学作为社会学的主要方法, 并训练了第一代的社会统计学家。到 1949 年国际社会学学会成立, 社会学研究已确立了自己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此后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和先驱者的研究相对应而发展, 如在马克思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冲突理论, 在涂尔干基础上发展的结构功

能理论，在斯宾塞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变迁理论，在韦伯基础上的发展的解释社会学及在齐美尔（G.Simmel）基础上发展的微观社会学等。

从经济学与社会学各自学科发展的定向历程中可以看到：

1. 社会学的起源晚于经济学的起源。从学科名称的出现看，即使不考虑最初的“经济学”术语，以“政治经济学”的最早出现而论，也要比“社会学”的学科术语的出现早 224 年；如以各自的学科祖师而论，亚当·斯密也要比奥古斯特·孔德早半个多世纪，而斯密的《国富论》则比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以第四卷出版的 1839 年为准），早 63 年。这种起源的时间早晚对各自的学科发展是有影响的。

2. 学科发展脉络和主流体系不同。经济学由斯密而始，经马歇尔的综合，发展为现代经济学，其学科发展脉络十分清晰，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业已形成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相形之下，虽然许多研究领域上，现代社会学仍有其源流脉络，但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或范式。正如特纳所指出，“问题是缺乏起统一作用的理论范式。这个问题被不同学者提及。这样一个范式应能将精力集中于某方面研究，并能累积成果。”^①

3. 学科界限的划分和清晰化。在社会学起源的 19 世纪乃至以前的历史，经济学与社会学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马克思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亚当·斯密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家”；涂尔干研究的劳动分工问题是斯密理论的一个命题，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问题；马克斯·韦伯既研究社会又研究经济，等等。但本

^① 参见特纳“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第 44 页。

世纪以来，在非主流经济学中仍能看到对社会问题基本上的关注和研究，但在社会学领域，在帕森斯之前，有关经济问题基本上被摒弃于社会学体系之外。究其原因，据说与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美国的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有关。社会学者试图和经济学者竞争大学的位置，结果遭到惨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学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社会学也因此而获得“剩余科学”的称号。^①

“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学”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定向历程看，二者之间似乎颇有点竞争的意味。从孔德为社会学“争得了地盘”，到沦为“剩余科学”，一方面是社会学发展了自己的学科，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与经济学的学科藩篱筑就，分界线就在于是否“剩余”。

然而，这种学科藩篱的筑就带有强烈的人为色彩，而且是学科体系化后相互敌视的结果。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两个分支，作为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的不同学科，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古希腊的文化遗产中，二者之间难分你我，相互耦合，而即使是现在，仍有诸多共同或共通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正如熊彼特（J.Schumpeter）所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②。正因为有这层

^① 参见李猛、李放春：“新经济社会学与中国”，载《社会理论论坛》，1997年第2期。

^② 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9页。